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康养的孝道文化传承与情感治理

李迎坤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7日

摘要

少子老龄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国的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 使家庭内部的照护资源与情感资源同步趋于稀缺, 由此引发孝道传承与情感联结困境。作为对这一困境的回应, 智慧康养在延伸家庭照护功能的同时, 也潜藏着孝道践行形式化与代际情感疏离的风险。这一风险本质上根源在于智慧康养工具理性的单向度扩张, 使身体在场被技术中介系统性替代, 孝道的情感本体面临被遮蔽的隐忧。基于此, 本文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家庭筑基、情感与伦理四个方面的路径建构, 引导智慧康养完成从效率优先到情感关切的伦理调适, 以期实现智慧康养在少子老龄化时代的孝道文化传承与代际情感治理。

关键词

少子老龄化, 智慧康养, 孝道文化, 情感治理

The Inheritanc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Smart Health Ca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Birth Rate and Aging Population

Yingkun Li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29, 2026; accepted: August 7, 2026; published: August 17, 2026

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with a low birth rate is reshaping China's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t an unprecedented pace, leading to a simultaneous scarcity of care and emotional resources within families and causing dilemmas in the inheritance of filial pie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connection. In response to this predicament, while smart health care extends the care function of families, it also poses the risk of formalizing the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and estr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s. This risk essentially stems from the one-sided expansion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smart health care, which systematically replaces physical presence with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and thus poses a hidden threat to the emotional essence of filial piet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path construction from four aspects—government leadership, social collaboration, family foundation, and emotion and ethics—guides smart health care to make an ethical adjustment from efficiency priority to emotional concern, with the aim of achieving the inheritanc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low birth rate and aging population through smart health care.

Keywords

Low Birth Rate and Aging Population, Smart Health Care, Filial Piety Culture, Emotion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65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1.9 亿, 占总人口的 13.5% [1]。与老龄化相对应的, 是“4-2-1 (2)”式的少子化家庭结构, 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或两个孩子, 家庭中夫妻需要承担抚养和养老重任。“十五五”时期,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预计年均净增近 1400 万, 高龄、独居、空巢老年人口将持续攀升, 老年抚养比很快超过少儿抚养比” [2]。少子老龄化背景下, 智慧康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照护能力不足的矛盾。然而, 一个深层的悖论随之浮现: 智慧康养在提升照护效率的同时, 是否同步回应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 孝道文化在技术化的养老服务中是被激活还是被架空? 系统审视智慧康养的内在逻辑、辩证看待其双重面向, 能够清晰认识到智慧康养的现有成效与不足, 为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康养指明未来的发展进路。

2.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孝道传承与情感联结式微

作为代际伦理的核心, 孝道文化的内涵丰富而多元, 是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文化根基 [3]。而少子老龄化正从时空场域和价值根基两个维度逐渐解构传统孝道文化的存续条件与代际情感联结, 导致孝道文化从日常可行伦理规范变为悬浮的道德理想、家庭成员的代际情感联结陷入应然与实然的深度撕裂。

2.1. 孝道传承的时空场域弱化

孝道文化传承是紧密嵌入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实践体系。费孝通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遵循“反馈模式”, 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 [4]。这一模式运转依赖于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持续的代际存在。然而, 少子老龄化恰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逐渐消解这一体系的存续条件。

空间场域的收缩构成孝道文化传承弱化的首要困境。首先, 当下少子化导致家庭规模持续缩小, 多代同堂的居住形态逐渐瓦解。这一状况使得孝道文化中的侍疾在侧、色养承欢等在场性要求失去了空间

载体。其次，家庭社会空间的离散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使父母与子女长期处于空间分离状态。由人口空间移动而产生的“空巢”现象，本质是子女不在场导致的代际关系的空间断裂[5]。最后，宗族、邻里、村社等社区文化空间的消退使孝道文化传承失去了社区空间这一支撑体系。

时间场域的压缩进一步加剧了孝道文化实践的困境。一方面，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护时间被压缩。独生子女一代在工作压力与照护需求之间的时间冲突几乎不可调和。另一方面，父母和子女之间代际共处时间也在逐渐减少，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极大压缩了代际之间共同在场的时间。综上所述，孝道文化的传承面临的不是子女道德层面的不愿尽孝，而是结构层面的无力尽孝困境[6]。

2.2. 情感联结的价值根基松动

少子老龄化在价值层面动摇了代际情感联结赖以维系的文化根基，导致孝道文化认知与孝道实践之间出现深层撕裂。儒家孝道对养老的规范，既强调物质方面的供养，也强调精神方面的供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7]孔子认为真正的孝应当是从情感上敬顺父母，积极用情去关爱和满足父母精神层面的需求。

少子老龄化进程冲击着家庭本位的情感模式。孝道文化传承的情感基础是“家本位”，即个体情感从属于家庭伦理，个人幸福服从于家族秩序。现代性进程改变了情感的分配逻辑，致使代际情感联结的断裂。年轻一代往往优先侧重于在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上进行投入，对父母的情感投入情感则呈现出非核心化倾向。孝道文化在公共叙事中的边缘化也加剧着代际情感联结的松动。在当代公共话语中，孝道叙事已大幅退隐，取而代之的是以权利、契约、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话语体系。当“常回家看看”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¹，需要借助法律来倡导孝道文化传承时，这既是以制度介入代际情感联结的必要措施，也是文化根基松动的具象化表征。

少子老龄化正从空间载体、时间资源、价值根基等多个维度解构着孝道文化的存续条件。然而，孝道文化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消亡，而是孝道文化传承从知到行的断裂。人们依然认同孝的价值，但缺乏践行孝的条件和路径。智慧康养的介入为超越这一困境提供了契机，但也带来了全新挑战。

3.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康养的内在逻辑与双重面向

从2010年开始，我国老年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高龄化趋势逐渐凸显[8]。在这一历史时期，与老龄化伴随而来的是智能化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蓬勃发展。智慧康养作为技术化的新兴养老服务模式应运而生。然而，智慧康养在功能层面延伸家庭照护边界的同时，其技术理性的内在逻辑也潜藏着孝道践行形式化与代际情感疏离的风险。厘清智慧康养的理论内涵与内在逻辑，并对它的双重面向作出辩证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构建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智慧康养体系。

3.1.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康养的内在机理

在少子老龄化时代，需要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对智慧康养加以把握。一是对智慧康养“是什么”进行理论界定，回答这一新型养老模式何以区别于传统养老服务；二是对智慧康养“何以可能”的逻辑阐释，揭示其在当下中国社会出场的内在驱动力，回答这一模式为何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成为必然选择。

3.1.1. 智慧康养的理论内涵

智慧康养作为一个外来理念，它在中国经历一系列的理念迭代。依据杨菊华教授的分析，可以将智慧康养定义为：它是利用新一代先进信息技术整合多方资源，跨越时空与人群边界，为老年人提供身心

¹https://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22.htm

并重的智慧养老服务，以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为核心目标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9]。

智慧康养包含三个需要深入辨析的学理维度。在“智慧”的技术维度上，智慧康养不同于传统养老服务的经验驱动和标准供给，而是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动态风险评估以及个性化服务匹配，实现照护从粗放到精准的范式转换。在“康”的价值维度上，智慧康养不仅涵盖老年人身体层面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保障，更指向心理健康、社会连接和精神意义等多维度的生命质量。在“养”的关系维度上，智慧康养不仅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供给，更应是一种嵌入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强调照护行为的情感性、关系性和伦理性的伦理实践。这意味着，智慧康养若要实现对孝道的文化传承，就不能仅停留于技术效率的优化，而必须在关系维度上实现对情感与伦理的回应。

3.1.2. 智慧康养的内在逻辑

在少子老龄化的特定背景下，智慧康养能够成为重要的养老服务模式，其内在逻辑可从治理转型、结构需求与技术发展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从治理转型逻辑层面审视，智慧康养在国家战略的主动建构之下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10]这一治理逻辑体现了养老责任从家庭向社会场域的转向，智慧康养由此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养老领域的重要实践形态。

从结构需求逻辑层面审视，少子老龄化在养老领域制造了严峻的供需失衡。供需失衡的现状为智慧康养提供契机。在需求侧，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照护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和高强度特征；而在供给侧，家庭照护能力持续下降，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智慧康养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照护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服务能力的规模化扩展，为破解这一现象提供破解结构性方案。在此逻辑下，智慧康养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即人口结构转型需要养老服务模式的范式创新。

从技术发展逻辑层面审视，数字技术的成熟发展为智慧康养的兴起奠定技术基础。物联网技术能对老年人健康情况和生活环境实现实时感知；大数据技术能够提供海量信息中提取和预测风险的分析能力；人工智能技术使个性化服务匹配和智能辅助决策成为可能。这些技术能力的集成，从根本上拓展了养老服务的可能性边界，使远程照护、实时监护从理论设想走向实践应用。技术的更新迭代，为回应结构性需求提供了现实路径。

3.2.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康养的双重面向

智慧康养是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结构需求、技术条件与治理意志共同作用的历史性产物。然而，必然性的存在并不等于充分性的实现。对现有关于智慧康养的研究和实践成效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智慧康养普遍侧重于技术维度，对价值维度与关系维度存在一定的忽视。这种理念与实践上的失衡，是导致智慧康养实践中出现有照护、无关怀困境的深层根源之一。

3.2.1. 技术赋能家庭赡养照护与情感关系维护

智慧康养的技术赋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的实践困境，并为代际情感联结提供了新的技术中介。智慧康养标志着健康管理的实时化。智能家居传感器、健康监测终端等物联网设备，对老年人核心健康指标的持续监测，并通过数据平台实现监测并自动预警，照护赡养得以跨越空间距离而持续延伸。智慧康养标志着日常照护的智能化。智能化、信息化设备，在老年人独居状态下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生活辅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人力照护的缺位[11]。在代际情感联结的技术中介层面，智慧康养为子女不在场的情感表达提供新的实现路径。视频通话、智能音箱、家庭数字平台等工具使跨越时空的代际沟通和日常化的远程陪伴成为可能。子女通过智慧康养平台为父母定制健康方案、参

与照护决策等行为，将关怀从抽象的情感意愿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行动。智慧康养技术在此意义上重构代际关系的时空形态，使虽远犹近的照护关系成为可能。

3.2.2. 孝道践行的形式化隐忧与情感关系的疏离风险

在肯定智慧康养技术赋能家庭照护与情感联结的同时，同样需要审视其可能衍生的伦理后果。智慧康养在提升养老效率的同时，也会存在将孝道践行推向形式化、使代际情感趋于疏离的风险。这种倾向会加速老年人精神衰老，降低他们的生命质量；加剧代际间的疏远冷漠，削弱以老年人本位的孝道文化及其秩序的传承与践行[12]。

从孝道践行的维度看，智慧康养有引发孝道从具身实践向符号性表达偏移的倾向。当智慧康养的远程监护、服务呼叫与数据监测系统逐渐替代子女的身体在场，孝道的践行会面临一种隐性的形态嬗变。这具体表现为，子女通过数字媒介确认父母实时状况、通过智能设备接收健康周报，这些行为在功能层面实现对照护需求的响应，却在伦理层面将孝道的践行，简化为上述符号性操作。孝道的形式依然存在，但支撑这些行为的身体共在基础已被悄然抽离。依照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这种情形在本质上是智慧康养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即将照护效率与功能覆盖作为首要考量，而孝道——作为承载价值理性的行动——其内含的情感意义与伦理厚度则被边缘化。

从情感关系的维度看，智慧康养中技术中介的介入存在引发代际情感淡化的倾向。依据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理解并非纯粹的理性推知，而是经由身体知觉的微妙交互而实现[13]。子女对父母情绪的感知，往往源于对父母步态、语调、神情等身体表达的细微捕捉。智慧康养以数据流和虚拟现取代代际间的感知通道，子女所接收到的是被技术系统筛选、转译后的健康指标与安全状态。这种感知方式的转变，使得那些只有在日常共在中才能自然萌发的深层情感交流，在技术的效率逻辑中找不到对应的位置。长期来看，代际互动可能日趋功能化与例行化，情感的浓度在不知不觉中被稀释。

孝道践行的形式化隐忧与情感关系的疏离风险表明，智慧康养在缺乏价值理性引导与情感治理自觉的情境下，会使孝道文化传承的情感本体被遮蔽。弥合这一张力，需要引入一种超越纯粹技术路径的治理范式，将技术重新嵌入情感关系和文化传统之中，将情感本身确立为治理的目标和评价标准。

4. 传承孝道文化与实现情感治理的智慧康养建构路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14]。这一顶层设计为智慧康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实现智慧康养的孝道文化传承与情感治理，需通过制度设计、社会协同、家庭重构与技术伦理调适等多维手段，系统性地将情感逻辑嵌入智慧康养的运行体系，实现孝道文化从传统家庭伦理向现代社会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4.1. 构建政府主导下孝道践行与情感治理的保障体系

实现智慧康养的孝道文化传承与情感治理，政府职责在于通过制度供给降低尽孝的难度，将情感关怀确立为智慧康养的法定服务目标，从而将孝道从个体的道德自觉上升为公共责任的制度化承载。一是要重构养老政策的价值目标体系。现行养老政策的目标体系偏重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生活保障层面，缺少老有所亲、老有所乐的情感关怀。应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作为智慧康养的重要目标，推动精神赡养向可操作的制度安排转化。二是要建立覆盖情感维度的服务评价体系。当前智慧康养服务的评价指标体系高度量化，主要聚焦于服务覆盖率、响应速度、健康指标改善率等硬性指标，而对老年人的孤独感、幸福感、代际关系质量等方面缺乏系统性关注。应当通过政府倡导，在智慧康养体系中建立情感质量评估机制，将精神质量、生活意义感评估、代际沟通频率与质量等指标纳入养老服务的综合考核体系，

引导服务供给从单一效率导向转向效率导向与情感导向并重。

4.2. 构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代际情感支持网络

针对当前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的结构性困境，需要推动孝道从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拓展。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作为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观念，是我国敬老文化的集中体现^[15]。这一思想为孝道文化从家庭推广至宗族、亲邻以及整个社会，以社会团结弥补家庭连带的不足提供理论依据。一是要激活社区这一孝道文化再生产的空间载体。随着现代化不断推进，社区应当扮演宗族和村社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角色，承担着孝道文化传承的社区功能。通过重建孝道文化的集体性表达场景，使孝道实践从私人家庭领域向公共社区空间延伸。二是要在情感照护领域号召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智慧康养服务体系能够弥补技术系统无法触及的情感维度，从而为老年群体提供心理疏导、情感陪伴等专业化情感服务。三是要推动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发展。鼓励年轻志愿者与老年人建立长效拟亲属关系的志愿服务模式。需要指出，这种社会化尽孝不是对家庭亲情的替代，而是在家庭照护不足的条件下对孝道精神的社会化拓展，即在家庭代际联结弱化的现代社会，需要构建超越血缘关系的新型社会团结形式以维系社会的有机整合。

4.3. 重构家庭筑基为基础的孝道情感表达与亲密关系

作为孝道文化传承与情感联结不可替代的核心载体，家庭需要在充分承认社会化养老必要性的前提下，探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构家庭孝道实践的路径。一是要重构家庭在情感联结中的重要地位。老年群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子女之间安全型依恋关系的维持。因此，智慧康养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帮助家庭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发现和表达代际之间的爱与责任。二是要正视现代家庭养老形态，推动孝道情感表达的转型，确立新型孝道实践观。传统孝道的情感表达高度依赖特定仪式场合，而现代社会子女与父母的空间分离已成常态。应当推动孝道实践向日常化、生活化转型，通过日常的关怀、简短的问候，保持情感联结的持续性和温度。三是要推进代际关系从权威与服从向理解与协商转型。现代亲密关系的基础正在从外在权威转向内在信任与相互承诺^[16]。孝道的现代形态不应强求年轻人对父辈的绝对顺从，而应在相互理解和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重建代际亲密关系。这种民主化的代际关系能实现孝道从基于等级的义务伦理向基于关怀的关系伦理转化，保留敬爱、关怀、责任等情感内核。

4.4. 构建技术向善原则下智慧康养的情感设计与伦理调适

针对智慧康养的工具理性所揭示的技术局限，需要推动智慧康养从价值中立的工具设计转向价值自觉的伦理设计。一是要将技术向善作为智慧康养技术发展的基本伦理原则，建立智慧康养技术的伦理影响评估机制。智慧康养的技术研发、设计、应用以及评价，都应当以增进老年人的福祉、维护其生命尊严为根本导向。二是要推动情感设计范式的系统性转型。智慧康养的技术设计应当从效率优先转向情感，具体而言，应当强化智慧康养平台的代际连接功能，使技术成为促进代际情感交流的媒介。三是要在智慧康养的开展过程中，坚守隐私保护与自主权尊重的伦理底线。智慧康养中的数据采集和监测功能必须严格遵守知情同意原则，老年人有权知道哪些信息被采集、被谁查看、用于何种目的，并有权拒绝或退出特定监测功能。应当在制度层面明确区分边界，避免技术强制逻辑剥夺老年人的自主选择权。同时，应当以确立人机协同的技术哲学定位，即技术承担标准化、重复性的照护任务，人力资源释放用于更需要情感投入和人际互动的照护环节，使代际间的情感联结始终居于照护关系的核心位置。

5. 结语

少子老龄化时代，智慧康养不能仅拘泥于一种实现对老年群体照护的养老模式，更应成为孝道文化

传承与情感治理重要手段。智慧康养要完成从“智慧助老”到“智慧孝老”的伦理升华，就要超越技术决定论与情感怀旧论的二元对立，在承认智慧康养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以孝道文化和情感治理为其注入价值灵魂。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家庭重构与技术向善四者相结合，能够使老年群体在少子化时代依然能感受到人间温度与伦理尊严，为老年群体开创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美好图景。

参考文献

- [1] 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 2026-05-15.
- [2] 黄胜伟. 推动“十五五”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J]. 中国社会工作, 2026(2): 32-33.
- [3] 孙鹏娟, 李豪豪, 袁喆. 数字时代的孝道分化: 互联网使用如何形塑双元孝道观念[J]. 青年研究, 2025(6): 169-187+193.
- [4]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7-16.
- [5] 郑雄飞, 吴振其. 孝而难养与守望相助: 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问题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2, 43(2): 147-154+2.
- [6] 张晶晶. 中国式老年照护模式中的孝道文化传承与发展[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6(1): 113-123+152.
- [7] 杨伯峻, 译注. 论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5.
- [8] 杨涵墨. 中国人口老龄化新趋势及老年人口新特征[J]. 人口研究, 2022, 46(5): 104-116.
- [9] 杨菊华. 智慧康养: 概念、挑战与对策[J]. 社会科学辑刊, 2019(5): 102-111.
- [1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2.htm, 2026-05-15.
- [11] 侯汉坡, 位鹤, 王颖超, 等. 我国老年智慧康养平台建设路径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24(2): 170-178.
- [12] 朱楷文, 王永益. 断裂与重塑: 老龄化社会的情感治理[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4): 82-90.
- [13] 张再林. 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到中国古代身道[J]. 哲学分析, 2024, 15(2): 59-68+197.
- [1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5-01-08(001).
- [15] 梁丽霞, 李伟峰. 情感养老: 何以必要与何以可为[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4(4): 124-135.
- [16] 张容南. 积极老龄化的儒家叙事及其孝养困境[J]. 孔子研究, 2024(5): 35-43+157-158.